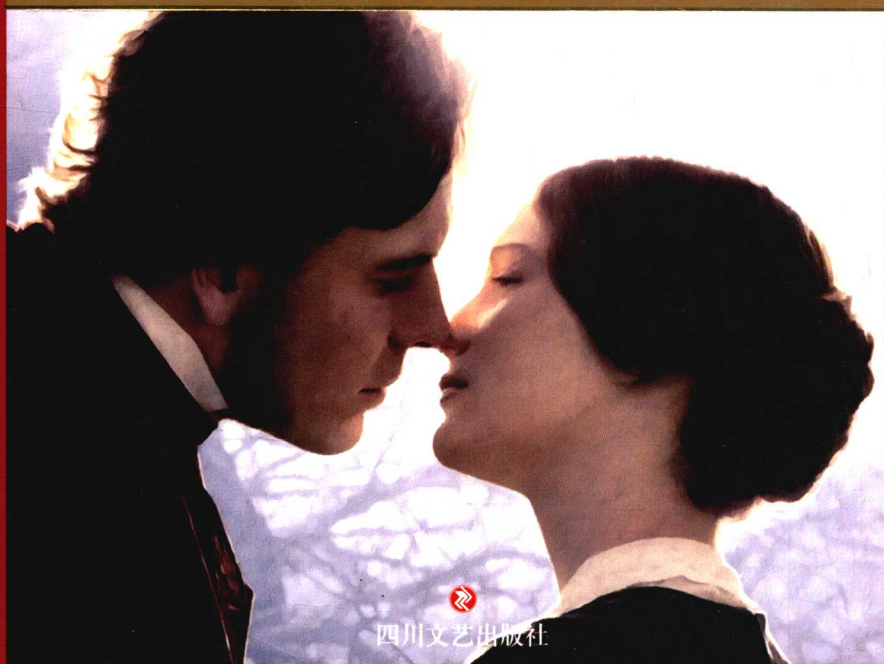


Classical | 经典译文

简·爱

(全译本)

[英] 夏洛蒂·勃朗特 著 伍厚恺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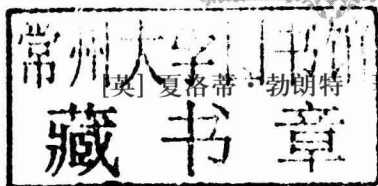


四川文艺出版社

Classical | 经典译文

简·爱

(全译本)



[英] 夏洛蒂·勃朗特 著 伍厚恺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简·爱 / (英) 夏洛蒂·勃朗特著; 伍厚恺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411-4860-6

I. ①简… II. ①夏… ②伍…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301386号

J I A N A I

简·爱

[英] 夏洛蒂·勃朗特 著
伍厚恺 译

责任编辑 郭 健
封面设计 叶 茂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王 冉
责任印制 崔 娜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18.5 字 数 480 千
版 次 2018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860-6
定 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导 读

(代序)

在盖兹赫德：一个九岁的孤女在一个阴冷的日子里带着一本书蜷缩在窗龕里；她被发现了并遭到殴打；她还击并被她的舅母关进了一间可怕的“红房间”。在洛乌德：这个小叛逆者，被遣送到一个伪善牧师监管的慈善学校去挨饿，被宣称为撒谎者，她结交的一个朋友海伦·朋斯因肺结核死在她的怀里。在桑菲尔德：她长大成人，当了女家庭教师，“贫穷、微贱、相貌平平、身材瘦小”，却坚持自己同显贵的男主人罗切斯特的平等地位，她爱上了他并为他所爱，结果他却有一个锁在阁楼里的疯妻子。在沼屋：这个叛逆者沦落为乞丐，找到了亲属，得到一笔财产，当有人专横地号令她通过一种形同死亡的婚姻去从事传教工作时，她也有力量抵抗。在芬丁：叛逆者回到失明和残废的罗切斯特身边，然后说“读者，我同他结婚了”。

这就是《简·爱》叙述的由五个部分组成的奇异故事，它在1847年10月里弄得读者大众目眩神迷，按照著名作家威廉·梅克庇斯·萨克雷的女儿安妮·萨克雷·里奇的说法，“使得全伦敦都在谈论、阅读和猜测”。安妮·里奇当时还是个孩子，她坦承她和姐妹们“手不释卷，这儿读几段，那儿又读几段，被从未梦想过的和至今没有想象到的一阵旋风给刮跑了。”夏洛蒂·勃朗特这本书的年轻的出版商乔治·史密斯这样回忆自己在一个星期天早晨开始阅读手稿时的情景：“故事很快抓住了我。12点之前我的马到了门口，但我无法放下这本书。”他推辞掉所有的约会，一边吃夹肉面包当午餐一边继续读。他囫囵吞下晚饭，“在临睡觉之前读完了这部手稿”。批评家弗雷德里

克·哈里森在1895年回忆道：“40年代《简·爱》问世，人们发现了一位新出现的天才和一种新的风格，我们都为之激动不已。”

《简·爱》不可思议的成功秘密何在？又是什么激起了后来对小说不利的抨击，将其视为一篇危险的、唤起性别意识的女性主义宣言，一部蕴含着为世所不容的怒火的灼热圣书，喷吐出宪章主义和19世纪40年代后期欧洲革命的火焰？《简·爱》非常个人化的叙述语调是不容忽视的。萨克雷曾总结这部书深入读者内心和打动读者心灵的力量，他在夏洛蒂·勃朗特英年早逝之后这样问道：“她的读者中有谁不是她的朋友？”向读者讲话的那种温柔亲密和坦率真切的语气，再加上小说初版时据说是一个叫作“柯勒·贝尔”的不知名者所编辑的“一部自传”，都使得小说的朋友们觉得自己遇见了一个不愿公开身份的人，并且希望了解有关他的更多的情况。与此同时，小说的敌人则被其凶猛的非女性化语调和富于煽动性的意蕴给吓坏了，竭力抗拒它的无所讳饰的感情和它的引诱力。在政治激进主义正威胁着稳定秩序的边界的时期，《简·爱》的声音表达着性爱激情、社会底层的渴求和女性的愤怒。公众的好奇心渴望着揭晓作者的隐匿身份。勃朗特姐妹都用了听上去很像男性的假名，因为她们知道文学批评界盛行着双重标准，也就是说女性作者是没有希望获得公正评价的。不过这署名之谜却恰恰使得公众要弄清《简·爱》真实作者的渴望如火上浇油。夏洛蒂·勃朗特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或者既是男人又是女人？夏洛蒂·勃朗特也就是阿克顿·贝尔和埃利斯·贝尔吗（安妮·勃朗特的《阿格尼丝·格雷》和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随《简·爱》之后于同年12月付印）？颇有影响的小说家和批评家乔治·亨利·刘易斯凭直觉察知，这部小说“来自一个挣扎、受罪、忍受深重苦难的精神的深处”，乃是一位女性的手笔。他也折服于小说的个人感染力：“你赞赏她，你爱她——爱她是因为那坚强的意志、坦诚的心灵、那一片爱心以及那个独特而迷人的人物。”他认为

《简·爱》以“现实——深刻的、意味隽永的现实”为特征，可谓触及了夏洛蒂·勃朗特的本质。

在作者身份为世人所知、并被伦敦文学界精英奉为名流的时候，刘易斯却又以一句玩笑话来伤害作者，他说：“我们之间应该有一条同情的纽带，勃朗特小姐，因为我们都写了些下流的书。”教养高雅的贵妇赫谢尔夫人忠告人们不要把这本书随手乱放，让自己的女儿读到，而保守的书评家伊丽莎白·里格比则在日后臭名昭著的评论中妄加猜测说，假如这部小说不是一个男人写的（《简·爱》里显示出对烹调和服装一无所知，似乎是出自男人的手笔），那么它一定是一个犯有性过失的人的作品。在作者的性别问题上，作为知识分子和小说家的哈里特·马蒂诺毫无幽默感地断言说，《简·爱》中某个描写在铜圈上缝纫的段落“只可能是一个女人或者一个装潢师写的”。其他人则认为那种富有力度的文风排除了作者是女性的可能性。

作者并不是一个初学写作者。夏洛蒂·勃朗特于1816年出生在桑恩顿，在约克郡的哈沃斯长大，早年丧母，因姐姐玛丽亚和伊丽莎白未成年而夭折，她成了关系紧密的小家庭中四个孩子里的长姊，这四个成长着的年轻作家后来为他们的安格里亚和冈德尔的幻想世界创作出了史诗式的文学作品。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是哈沃斯的圣迈克尔和众天使教堂的终身副牧师，薪俸微薄，全家维持着穷困而劳苦的体面生活。担任学校教师和女家庭教师的夏洛蒂因为发育不良、肤色难看、其貌不扬而饱受自惭之苦，别人待她就像她“并不存在似的”，正如她曾苦涩地述说过的那样：一个女家庭教师“并不被认为是一个活着的、有理性的生命”。她在1842年抓住了到布鲁塞尔的赫格寄宿学校受教育的机会。她在那儿爱上了她的教师康斯坦丁·赫格，这段爱情尽管似乎很痛苦，却激励着她去向他学习写作原理和接受编校训练，而在1844年她返回哈沃斯之后，发现了妹妹艾米莉的诗歌手稿，便鼓励她的两个妹妹于1846年出版了她们的诗集。1847年，她们着

手出版艾米莉的小说《呼啸山庄》和安妮的《阿格尼丝·格雷》的书稿，也包括夏洛蒂的《教师》，但后者被退了稿。夏洛蒂并不气馁，开始写一部新的小说，在1847年8月24日将书稿送给了出版商乔治·史密斯。几个月内，这位隐士便成了轰动当世的名人。

《简·爱》的政治内容

《简·爱》是一部关于权力和冲突的叙述，构思于一个充满政治与社会动荡的时期，写作于英格兰北部工业区一个羊毛制造业小城。面对小说提出的对个人自由的要求、对不仅是生理的而且是智能和情感的饥饿状态的论断，以及其好质疑的主人公对权威的一系列挑战，保守的出版界所表现出的焦虑心态正是上流社会在感受到威胁时的反应：“在国外颠覆了权威和破坏了每一条人性的和神圣的法则、在国内孕育了宪章主义和叛乱的那种思想基调，与写作《简·爱》的思想基调是相同的。”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宪章运动^①以群众示威、暴乱、罢工和大规模请愿的方式，表达了工人阶级身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经济苦难之下的愤怒。因机械生产而贫困化的大众，在愤怒中联合起来，抨击不平等、要求男性普选权、坚持平等权利。1847年的欧洲正不可遏止地迈向1848年的革命^②。《简·爱》的写作正值上述事件趋于高潮的时期，而在人们阅读它的时候，被统治阶级视为威胁着“文明”本身的这种暴力狂欢则已达到了顶点。

① 宪章运动得名于1838年由威廉·洛维特修订的“人民宪章”，是一次从19世纪30年代后期直到40年代为争取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工人阶级运动，以争取普遍的男性选举权为核心。对议会的群众性请愿在1848年的大规模请愿时达到顶峰，征集到六百万签名。

② 1848年的欧洲革命是资产阶级要求进行自由主义改革的压力、造成饥荒与动荡的严重经济危机和谷物歉收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和起义者双方均使用了巨大暴力，革命很快被镇压。

然而，这个故事写的是一个孤女的个人命运沉浮和艰苦努力，她的学校生活和做家庭教师的经历，她正直地拒绝同雇主私通而最终获得了幸福与合法的婚姻，它到底同宪章主义有什么关系？1848年4月，在欧洲革命已经蔓延到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帝国之后，在伦敦发生宪章运动“大请愿”的同月，《基督教醒世杂志》指责《简·爱》燃烧着“道德上的雅各宾主义”：“从来没有比这本书中更厉害的仇恨者了。‘不公平，不公平’，这是对现存权力所做的一切反思的要害。”12月，当革命已经掀起风暴并已失败，《评论季刊》还抨击《简·爱》本质上是一本非基督教的书：小说“对富人的舒适和穷人的贫困喋喋不休”，意图在于“傲慢而反复不停地坚称人的权利，对此，我们无论在上帝的话中还是在上帝的意旨中都找不到依据。”

1855年，《简·爱》出版近八年之后，《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还把欧洲革命同《简·爱》联系起来作为各种社会混乱力量的表现：“政治这口大锅简直是在疯狂沸腾，它将你们的法国君主制搅得一团糟，并用一种新东西取而代之。这就是你们真正的革命。法国不过是西方政权中的一个，女人占了世界的一半。”《简·爱》被当作一篇女性主义宣言来阅读，那个时候，已婚妇女在法律上完全没有地位并且（根据不成文法）完全没有财产权或离婚的权利；妇女既不能投票选举也不能进大学或从事专门职业。《布莱克伍德杂志》上文章谴责《简·爱》是一篇煽动性文献，它激起整整一代妇女作家趋向“粗野”和暴力。妇女解放唤起了性随意和女人男性化的幽灵，威胁着父权制家庭和国家。像乔治·桑这种抽雪茄烟、穿长裤的女作家和声名狼藉的女人，在革命的巴黎竟当上了选举的候选人。在巴黎和维也纳的街垒里，女人们同男人肩并肩战斗。

对《简·爱》的这些诅咒是小说核心中的那种富于激情的自我肯定所引起的反应：“我关心我自己。我越是孤独，越是没有朋友，越是缺少支持，就越要自尊自重。”（第二十七章）简·爱反叛主人

们所运用的修辞语言来自工业化世界中的贫穷与疾病，人们在那里挨饿，待遇就像他们所服务的机器，而不是作为人受到尊敬。她要求弄清楚：“你以为我是一架自动机器吗？——是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吗？我能忍受得了一口面包被人从嘴里夺走吗……”（第二十三章）她宣称同她的雇主是“平等”的，而他却无法否认这一点。简·爱发誓要“遵从由上帝颁布并为世人认可的法律”。（第二十七章）这一点植根于并服从于她的至高无上的自我价值意识。因此，个体的人权位于《简·爱》伦理学的核心，而保守的评论家们（她们自己往往也是女人，却站在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女思想警察的反常地位上）在书中看出了这些意义，倒也没有弄错。简·爱和罗切斯特之间的爱情被他们加以政治化阅读：“这种狂暴的性爱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狂热的‘人权宣言’……‘让他来俘虏我、占有我、制服我……让我们一决胜负’。”简·爱对她的“主人”的性爱化挑战，被他们根据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的话语来阐释，看作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参与性行为的许可证。

《简·爱》的作者是个托利党人和英国国教徒，她肯定既不是宪章主义的同情者，也不是革命者。不过夏洛蒂·勃朗特倾向于使用强有力的、极端的语言，而且尽管她反对她的朋友玛莎和玛丽·泰勒的激进主义，她却内在吸收了激进主义的语言。她的政治是双重的，反动的保守主义同激进的个人主义混合在一起，因为，作为一个劳动妇女，她被迫在一个将独身劳动妇女当作廉价劳动力来剥削的世界里自力谋生。如《星期六评论》所说，婚姻是“妇女的职业；她的训练——依附性训练——就是以这种生活为模式的”；一个未婚女性就是“在职业上遭遇了失败”：女家庭教师报酬微薄，“因为她们出售的货物没有价值”。《简·爱》愤怒地控诉了被上层社会贫困化了的中产阶级妇女的屈辱：英格拉姆一家，一个富有的、拥有土地的家族，在简·爱能听见的时候故意贬斥女家庭教师，其实才是些没有价

值的人——唯利是图、愚笨无知和粗俗不堪。小说拒绝对他们给予尊崇，而坚持诚实劳动的价值与尊严。它显示出，仆人和从属者尽管外表看来安静而沉默，却在豪华邸宅的私室里观察、评判和诅咒着自己的“上人”。就是这个吓坏了的里德太太，简·爱那惨淡童年的诅咒给她打上了耻辱的烙印。《简·爱》也暴露了“慈善”机构里对儿童的虐待。它揭开了掩盖在一个病态、混乱和虚伪的社会之上的盖子。

简·爱经济状况的改观是一则自助的寓言，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作为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和女家庭教师，她既不属于仆人也不属于雇主阶级。雇佣条件是简·爱同她的雇主之间讨论的一个话题，后者“好像忘记了为了我听他吩咐，他一年付我三十镑哩”（第十四章）。社会预言家托马斯·卡莱尔视为现代社会中使雇主和受雇者之间的关系丧失人性并使双方堕落的“现金交易关系”，是《简·爱》中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当那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告诉她的“主人”说“生而自由的人没有谁会甘愿忍受”雇主傲慢无礼的对待时，他回答道：“胡扯！大多数生而自由的人为了一份薪水什么也甘愿忍受。”（第十四章）经济关系受到激烈的质疑。最终，情节的发展轨道趋于保守，因为简·爱本是位“上流妇女”，并在绅士们的世界里找到了亲属，在继承的财富中获得了“独立”。

小说煽动性的修辞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为什么它的政治内容对于夏洛蒂·勃朗特自己那一代人显得是那样具有激烈的颠覆性。就像宪章主义者说自己是“白肤色的奴隶”并发誓要摧毁身上的锁链和冲破牢笼一样，孩提时代的简·爱（也像宪章主义者）读书颇丰并从阅读中推演出自己的结论，她从古罗马和现代社会的奴隶起义者那里借用语言来反击约翰·里德：“邪恶的狠毒的坏孩子！……你就像一个奴隶监工——你就像罗马皇帝！”（第一章）。第二章开篇处写道：“我一路反抗……就像任何反叛的奴隶一样，在绝望中又感到很坚定，决心坚持到底。”小说前面几章引入了一场关于屈服与反叛、囚

禁与解放、为正义而战与忍辱负重的责任的对话，直到临近小说结束才平静下来。小说写的是一连串反诘，那个狂怒的孩子咆哮道：“我怎么敢吗，里德太太？我怎么敢？因为这是事实。”《简·爱》谈到奴役和反叛，它最打动人心的感情是狂怒，它的情绪是炽热的。热与火的意象占据压倒优势，而桑菲尔德及其主人则受到火灾的惩罚。隐含的火的意象（小说描写简·爱是“火热的”，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的“燃烧”）在整部小说中处处点燃火星。所有她曾落脚的地方——盖兹赫德、洛乌德、桑菲尔德、沼屋——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巴士底狱，她必须从那里逃离，奔跑、乘车或者（从桑菲尔德）手膝并用地爬行。

现代批评家们从21世纪的视角看这部小说，质疑《简·爱》里的性政治和种族政治。简·爱不再被看作具有颠覆性局外人身份的普通女人，而最终与“我们”——英伦岛国的中产阶级相认同。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们强调，简·爱继承的遗产是奴隶贸易的掠夺物；伯莎·罗切斯特作为西印度“克里奥耳人”，无论是白人还是混血种，是被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妖魔化了，而且小说是以简·爱和拥有土地的绅士阶级缔结舒适的、排他性的婚姻来结束的。这些批评家坚持用“确凿无疑的帝国主义原则的意识形态”为标准，来阐述小说对伯莎·罗切斯特的帝国主义式的处理。依照这样的阅读方式来看，小说将罗切斯特的前妻处理为一个堕落种族的非道德的疯子表明了一种令人作呕的种族主义，而这样实际上便玷污了小说和简·爱的婚姻的伦理意义。夏洛蒂·勃朗特坦承她对伯莎个人和她的困境所表现的关注太少，但她在《简·爱》里绝非要直面种族问题。

虽然人们如此关注小说的这个想当然的“核心”，却不应该蒙蔽了我们的眼睛，而看不到它以强有力的方式紧紧抓住了例如对儿童的制度化虐待等问题：《简·爱》里有一种烧灼般的主体意识，它使读者体验到在“慈善性的”“基督教的”机构中孤苦无助的孩子们身

受肉体惩罚、有计划的饥馑和寒冷与疾病时那种潜藏的恐惧。在夏洛蒂·勃朗特看来，对于一个建立在对年轻和无助者滥施暴力之上的英格兰，这部小说揭开了捂在它上面的盖子。《简·爱》的公开揭发比狄更斯在《雾都孤儿》（1838）里暴露的《济贫法》颁布之后贫民习艺所里的野蛮状况更加令人震惊，因为通过《简·爱》亲密的第一人称语气，资产阶级读者将读者之“我”融化为了那个孩子之“我”，从而进入了受苦孩子的体验。读者被痛楚地关闭进简·爱的心灵——看见了海伦赤裸颈子上的鞭痕——通过简·爱颤抖的感官，读者被想象性地暴露于洛乌德学校的饥饿体制之下，并被要求按照基督的训诫去考虑它：“这些事你们既然做在了我的兄弟们当中一个最小的身上，也就做在了我的身上……离开我，你们这些被诅咒的人，进入到永恒的火里去。”（《马太福音》）从上流公立学校到最低贱的教育机构，殴打和暴行都很盛行。

“造反奴隶”的孩子气的反叛，让位于成年后喷发而出的对父权制不公正的控诉。在至关重要的一个片段里，简·爱的抗议明显表现出女性主义特征，而其语境则是一个千百万人被迫沉默的国家。

说人应该满足于宁静，那是徒然的：人应该有所作为，当他们找不到作为时就应当创造作为。千百万人被迫承受比我还静寂无为的厄运，千百万人在无声地反抗他们的命运。谁也不知道，人们所埋葬的众多生命中，除了政治反叛而外还有多少其他的反叛在发酵酝酿。女人的感受正和男人一样，她们需要运用她们的才智，和她们的兄弟一样，需要一个努力的领域。

（第十二章）

这是熟悉的激进语言，对“千百万人”和“大众”的双重呼唤，激烈地提醒统治阶级不要忘记上层社会是渺小的，而被压迫者则远

远多于他们。宪章主义者就把工人阶级称作“千百万人”，这一用语刻意要唤起恐惧。简·爱的姿态明显具有威胁性和预言性：被压迫者“必定”会诉诸行动，他们“必将”这样做。“女人的感受正和男人一样”的表述否定了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国家和家庭（也就是父权制社会秩序）构建基础的性别区分。小说处处存在的象征是火灾、骚乱、激愤、反叛、火山似的喷发、疯狂和爆炸，在这样的语境中，前面所引的那段女性主义宣言，不管其目标在我们今天看来有怎样的局限（仅仅针对妇女教育和从事职业），几乎不能不是富于煽动性的。

《简·爱》立即就被认出是一个北方人写的书。作者生活在工业激进主义的中心，靠近宪章运动中心凯利、杜斯伯里、赫德斯菲尔和托德莫顿。夏洛蒂·勃朗特曾经目睹过群众饥馑和失业。当简·爱流落在惠特克罗斯附近的沼泽地、无家可归和饥饿难挨的时候，她被错认作流浪者、窃贼或娼妓。尽管小说背景设定在较早时期，主要是在19世纪20年代，但简·爱这副模样在读者心中可能唤起的形象，则是从1834年严酷的新《济贫法》、从失业或者从一个妇女依附于男人的世界的深重灾难里脱逃的许多女乞讨者中的一员。

简·爱与自我

女主人公的名字与其说是身份的表述，不如说代表着对身份的疑问。当构思和安排都十分紧凑的情节带着强大的动量向前发展的时候，“简·爱”这个名字就像一个古怪的梦一样不断被提起和被质疑，反复回荡于缺失的起源中。简·爱对父母毫无记忆，对自己属于哪里——假如她还有所属的话——也没有清晰的概念。她的名字常常被第一人称叙述者以第二或第三人称叫出来。她告诫自己：“那么听着，简·爱。”这个名字与自我分裂和面目缺失相联系，因此似乎存在着两个简·爱，一个是理性的，另一个是情感的。“昨天的简·爱

又在哪里呢？”简·爱在未能成为“简·罗切斯特”之后感到困惑：“她的生活在哪里？——她的前途在哪里？简·爱，她曾经是一个热切的、满怀希望的女人——几乎做了新娘——又成了一个心冷如冰、孤独凄凉的姑娘了。”（第二十六章）怪异的是，“我”这个人与“简·爱”这个名字的联系似乎断裂了。在对亲属泄露了自己的姓氏之后，她返回罗切斯特先生身边也就是同自我的重新结合：“我是简·爱……我回到你身边了。”（第三十七章）

姓名具有符咒般的效力。“简”是艾米莉·勃朗特的名字“艾米莉·简·勃朗特”的中名。有一个姓“爱”的家族拥有哈瑟塞奇附近地区乌特西茨的李斯北园，其第一个女主人阿格尼丝·阿休斯特曾作为“疯女人”被囚禁在三楼的一间墙上装了衬垫的屋子里，并因火灾而死。夏洛蒂·勃朗特曾在1845年访问过李斯北园，有人提出可以把这里看作桑菲尔德庄园的原型。这样的联系使没有归属地的女主人公植根于一种地方感和历史感之中。不过，“简”这个名字却富于其他各种联想，小说中凡是提起“简”的时候都微妙地激发起这些联想。这个巧妙的暗示之网对阅读体验产生了一种离奇的效果，使人对一连串充满情感的启示浮想联翩却又悬而未决。就在海伦死后，简·爱来到洛乌德外面沉思着被召唤离开这个世界的幸： “不得不去——谁知道去哪儿呢？”（第九章）而她又对基督教的天堂持怀疑态度：“可是你去的是什么地方呢，海伦？你能看得到吗？你知道吗？”在小说的高潮处，她听见有个声音在呼唤自己的名字：“简！简！简！”她询问：“那是什么？”这时她明白自己最好再问“它在哪儿？”，接着就询问那个看不见的声音：“你在哪儿？”

小说中寻找身份的紧张感因反复运用不多的几个关键词、短语及其同义词而得到强化。这些关键词涵盖了基本的和原初的人类灾难。它们同我们对食物、温暖、火、家和住所的需要有关系。“家”带有一种死后的天堂之家的意义；“漫游”可以意味着一次悠然散步或

迷失道路；“休息的地方”可以是坟墓；急切期盼的“目的地”可以是地上的家，或者是《哈姆雷特》中说的“没有一个旅行者从那里回来”的地方；“主人”可以是暴君或者情人。

“我的主人”：权力、性和婚姻

《简·爱》最复杂和充满矛盾的方面是它对性别关系和婚姻的处理。简·爱带着强烈的情感意味称呼罗切斯特为“我的主人”，但她鄙夷地否定布罗克赫斯特、约翰·里德和圣约翰·里弗斯的“主宰”。她激进地坚持着女性的自主性，其中却又交织着与心爱的“主人”相融合并同他结合为一体的渴望。我们知道，《圣经》里基督对于他的信徒来说是“主人”，这个词结合了爱与尊敬。罗切斯特作为土地士绅阶级成员和她的雇主，在字面意义上说是简·爱的“主人”。但简·爱对这个词的使用具有性的意味，它几乎可以看作是一种爱称和拜伦式的和霸道的罗切斯特对于简·爱的性吸引力的符号。这个词的使用下面潜藏着夏洛蒂·勃朗特对她的老师康斯坦丁·赫格的炽烈感情——她在那些痛苦地泄露真情的书信里称他为“我亲爱的主人”、“曾经为我所有的唯一的主人”。甚至在小说结尾的几章里，当简·爱以独立平等的身份回到罗切斯特身边时，与她抛开雇佣关系而离开时相比，她的情人不折不扣地仍然是她的“主人”。

然而小说仍然对整个“奴役”观念予以质问和怀疑。罗切斯特在那场流产的婚姻之前对简·爱“暴君”式的态度并不对她的胃口。她坚持平等，甚至确实还坚持自己更优越（“我比你要好——让我走！”）。相应的，无论罗切斯特的傲慢怎么具有父权家长作风，也不仅承认简·爱“和我平等……也和我相像”（第二十三章），而且在他告诉她“我在十八岁的时候和你不相上下——完全不相上下”（第十四章）时，承认了自愧不如。他反过来把“主人”一词用在自

己对她的关系上：“你让我快乐，你主宰了我”（第二十三章），而且情节的发展剥夺了他过剩的力量，从而在她重返芬丁时，他已深感悔悟，几乎像参孙一样瞎了眼，也像参孙一样要由人引着走路，而且残了一只手。这强有力的对立性给作品提供了几乎持续不衰的推动力，使简·爱这一中心人物获得了她的能量和影响力：“我不懂折中，”简·爱在谈她同圣约翰的关系时告诉读者：“在和独断的、强硬的性格打交道的时候，在绝对服从和坚决反抗之间，我一生中从来不知道有什么折中的办法”（第三十四章）。

平等主义婚姻是《简·爱》的理想，在这种婚姻中弱小的女性成为在其他方面过分强势的男子的支撑。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被证明为成问题的这种幸福婚姻，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和宗教法则的标准，也是不合常规的。在《简·爱》中，神圣的是人性之爱而非宗教之爱。夏洛蒂·勃朗特设法窃取《圣经》的雷霆和借用《圣经》的语言来颠覆《圣经》，表达了宁愿服从自然冲动而非宗教渴望、喜欢婚姻之床甚于教堂座位的思想。温柔而忠实的性爱是比较宗教热忱更高的力量，夏娃主宰着亚当。一对恋人快乐的机智妙语使他们的和谐生活情趣盎然：对于罗切斯特的牢骚话“我丑陋吗，简？”简·爱回答说：“非常丑陋，先生，你一直就丑陋，这你知道。”（第三十六章）

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将在《论妇女的从属地位》（1873）中写道，在英国法律下妻子是其丈夫的“契约奴隶……就承担的义务而言，不折不扣就是奴隶”。《简·爱》在叙述中对“被奴役状态”的危险和诱惑是如此敏感，但它仍然将婚姻当作一种圣礼加以崇敬：它确实是如此神圣，以至于取代了圣约翰·里弗斯所代表的“与神圣羔羊的婚姻”（在《圣经》启示录中，这种神秘的婚姻代表着基督徒来世与基督的结合）。里弗斯作为“基督的新娘”，向简·爱提出了如同罗切斯特的第一次求婚那样无效的婚姻，因为里弗斯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已订婚的。他所提议的夫妻关系可能涉及

法律许可的体制性强奸：“我能忍受这种爱的一切形式吗（我不怀疑他是会严格遵守这些形式的）”（第三十四章）。男人对女人的强暴被夏洛蒂·勃朗特以一种当时显得很独特的毫无掩饰的直率方式来处理，圣约翰含蓄地求婚而罗切斯特则心里想着强暴：“即使我拆散、捣毁这间脆弱的牢房，我的暴行也只不过释放了牢中的囚徒……”（第二十七章）。两个男人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不管他们当中任何一个是否愿意承认。

这一平行结构解释了小说何以有双重的和富于启示性的结局。小说的结束并不是简·爱的婚礼而是圣约翰·里弗斯做了“新郎”。濒临死亡的里弗斯进入了与上帝结合的神秘婚姻，而简·爱则选择了鲜活的人类心灵之路。根据英国国教祈祷书，男人同女人“肉体结合为一”意味着“基督同他的教会之间神秘的结合……因为基督爱他的配偶教会，他把自己献给了它，爱它和珍惜它甚至有如他自己的血肉”。《简·爱》就这样走着一条矛盾的基督教邪说和悖逆传统主义的道路，它对象征物（人类婚姻）的喜爱超过了对象征意旨（同基督的结合）的喜爱。

文学渊源

《简·爱》是一部包含着许多书的书，是一个互相套叠的叙述。当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人物在读书和解释书的时候，我们也从他们的肩头上观看，并听见他们在讲述一个个故事。简·爱交叉着腿坐在窗台上，沉思着比尤克的《不列颠禽鸟史》的一页页文字；贝茜从歌谣、民间故事和通俗小说中收集的故事迷住了她；海伦·朋斯细读着约翰逊博士的《莱西拉斯》，简·爱则对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玛米恩》入迷。这些人物不仅反复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简·爱的生活故事循环地一次又一次被讲述），他们还着迷地互相“阅读”骨相，